



“天书”之城(二)

□ 范德平

《尤利西斯》是我碰到的最难读的书，乔伊斯在书里内置了许多语言的机关，象征、嵌套、外来语、孤僻词、古英语、拉丁文、谐音梗……扑面而来。在语言方面乔伊斯真可谓天赋异禀，他精通多国语言，在《尤利西斯》中，他时时不忘弄点语言的狡狴，他使用了三十多种语言，全书除了夹杂着法、德、意、西以及北欧多种语言外，还时常使用希腊、拉丁、希伯来等古代文字，包括梵文。最后长达四十多页的意识流篇章充满了小玛德兰点心式的无标点回忆，读来令人眩晕。

这是拿拿放放最读不下去的书。阅读它考验着耐心，有时我捧着这块大砖头，顽强地把它当作面包来啃，啃着啃着，发现它竟变成了中国的馒头。有时捧起它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读着读着就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自己。

你想象不出，我读到第十五章时是何等惊讶。十五章简直就是个戏剧剧本，我付券，乔把它写成这个格式，其目的不外乎是向易卜生致敬。

我几乎看到了额外的戏码——易卜生、乔伊斯一老一少站在这一章的最后向观众谢幕……当五百五十页上那段文字向我涌来时，我领略了什么是彻底的震惊，那感觉庄重而持久。我说过，爱尔兰就是认定了的“乌托邦”，谁知道乔伊斯居然也是这么想的。他通过布卢姆的嘴，说出了与我如出一辙的想法。

那段台词的大意是这样的：“我主张整顿本市的风纪，让新的世界取代旧的。每一个大自然之子都将领到三英亩土地和一头母牛。豪华的殡仪汽车。强制万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的公园统统昼夜向公众开放。电动洗衣机。一切肺病、精神病，战争和行乞必须立即绝迹。普遍大赦。每周举行一次准许

戴假面具的狂欢会。一律发奖金。自由货币，豁免房地租，自由恋爱，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

的博爱。”这段表述“乌托邦”的文字团将我国住，我被惊讶所裹挟，那一刻岂止是暗爽，鼻腔里涌动着酸胀，泪水欷歔而出，这带着盐的液体，把我内心的激动带到了体外。我无法抑制这激动，乔伊斯的怀抱和骨血里竟竟着和我一样的东西，我们的想法竟然如此惊人地合拍，我不得不双手合十默念：世界请掉过头去，愿爱尔兰成为乌托邦的现世。

还有神合的，正如我对爱尔兰的憧憬一样，乔伊斯何尝不也是在眺望东方中国。他在《尤利西斯》中多次写到中国，这正是面包变成馒头的缘由。

他同情中国人，说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身上的气味，中国人被鸦片迫害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他想象着如来佛，手托腮帮，安详地侧卧在博物馆里。在他笔下古老的

中国充满了东方的神秘，中国人讲究吃放了五十年的鸭蛋，颜色先蓝后绿。一桌席上三十道菜，每一道菜都是好端端的，吃下去就掺和在一起了。

他这样描写一个清朝打扮的人：“穿的是印有蜥蜴形文字的黄色中国朝服，头戴宝塔式高帽。笑吟吟地摘下帽子，露出剃过的头，脑顶翘起一条根部扎着橙黄蝴蝶结的辫子。”他还提到中国魔术：中国人有一些看上去像是油灰的小药丸。把药丸往水里一放，就绽开了，个个都不一样，一个变成船，另一个变成房子，还有一朵花儿。中国的薄绢，从一只倾斜的瓮口里垂下，瀑布般的飘带，红艳艳的血。写到文身时，说是“用中国最黑墨刺的一片锚状花纹”。在书的最后摩莉的意识流篇章里也突然冒出一句“我猜想在中国，人们这会儿

准正在起来梳辫子了，好开始当天的生活。”

最先向中国介绍乔伊斯的是茅盾和徐志摩。因学业的需要，曾写过一篇作业曰《中国报章小考》。我查阅过张东荪主编《时事新报》，彼时的报头已由创办时的汉隶改成了行楷，我明白报人的意图，无非是弃古抽而求“时新”。这家报纸的《学灯》副刊初期的主旨是促进教育、灌输文化，是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上海图书馆数字化了《时事新报》的所有版面，1923年7月6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有篇徐志摩的诗文，他把乔伊斯在文坛的声名鹊起与列宁在政坛的影响相提并论，说到《尤利西斯》一问世就遭到不虞之毁。

原来，书稿迟迟不能出版，英国美国谁都不肯也不敢替他印。乔伊斯对妻子罗拉说：“创造一篇作品，就像你把你所爱的孩子带出子宫一样艰难。”徐志摩说这本书最后的意识流的气势如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文字像牛酪一般润滑，像教堂里石坛一样光洁。茅盾先生介绍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文章见诸1922年的《小说月报》。

还是吃我的早餐吧。繁华的奥康内尔大街上无限量供应着“布卢姆早餐”，这绝对是借着乔伊斯盛名卖的一个噱头。

《尤利西斯》第四章开头有一段：布卢姆先生吃起牲口和家禽的下水来，真是津津有味。他喜欢浓郁的杂碎汤、有嚼头的胗、填料后用文火焙的心、裹着面包渣煎的肝片和炸雌鲑卵。他尤其爱吃在烤架上烤的羊腰子。那淡淡的骚味微妙地刺激着他的味觉。如今小说里的生动描述已成为都柏林美食之旅的最佳广告。

这早餐让人脑洞大开，都柏林为了《尤利西斯》中的桥段转化

为经济效益，居然敢用这个重口味的早餐来掏游客们的银子。什么是经济头脑？

就是要敢想啊！不光是劳动力才能产生剩余价值！犹太人的生意格言是：要把自己没有的东西，卖给不需要的人。马云就敢想，他把网络变成硕大无朋的产业，他也在网上做到了“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卖给了所需要的人”。

成功人士就是善于找到钱的时间差，堂而皇之着用别人口袋里的钱，富有而光鲜。然而，谁也没有权利对靠自己打拼、用诚实劳动来安身立命的人有些微鄙视。就像乔伊斯一样，他关注的是城市贫民，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的财产是超过一千镑的。手指一滑——弹远了，不提！

还是说早餐。最初店家也是大差不离按着《尤利西斯》第四章上的菜单来做的，但是面对一盆重口味的羊腰子、猪下水、血肠布丁，游客中十有八九都是皱着眉头不敢下箸。

后来店家不得不改良，给我上的“布鲁姆早餐”还算清爽——两段熏肠、一片培根、一只荷包蛋、两片西红柿、两块布丁。

尝了以后，要我打分，至多给个“差强人意”。不过，也有加分项：炊爨在后作，厨艺固然是看不到的，那个“乔”装打扮跑堂的是个卖点，他戴着宽檐帽和圆圆的小眼镜，冒一活话脱脱的一个乔伊斯，就是脸团圆了一点。他忙不迭在店堂里送餐，饕客们纷纷上前与他合影，权当都柏林之旅的有趣前奏。



喜欢“平装软皮”

□ 杨方

很讨厌硬皮书。枕上读书本来是一件很舒适惬意的事，但硬邦邦的封面弯折不得，就只好用手托举着，像举着一件重物，远没有封面可卷到书脊上的软皮书读着舒适。读精装硬皮书实在是个力气活，而读平装软皮书，就舒适随意得多。

说到软皮书，就想到“军供版图书”，据说二战时期某国专门为士兵设计的图书，都是软皮书，尺寸刚好能塞入士兵裤袋，阅读和携带都很方便。让人没想到的是，“军供版图书”竟造就了世界出版史上的一次革命，平装软皮书因此在当时迅速流行起来。

然而近年来，不知为什么软皮书逐渐式微，而精装硬皮书在出版界占

据了半壁江山。出版商为啥热衷于出版精装书？没错，精装书利润高。图书不仅是用来阅读的，还有装饰的功能。有些人为了冒充文化人，家里就喜欢摆一些书装门面，而豪华精装书锁定的正是这些人。

出版商非常懂这些人，有钱没文化，但又希望被人看成是有文化的，于是拼着劲把图书设计成豪华大气的样子，即满足了某些“读者”装门面的心理，又可以赚得更多钱，真是两全其美。

所以，阅读精装书感觉是力气活的读者，肯定是选错了书，用来阅读就应该选平装软皮书，但遗憾的是平装软皮书越来越少。

受智能手机影响，本来纸质书阅

读就已经是个挑战，而精装硬皮书更是拒人千里之外，读精装硬皮书不仅是个力气活，还浪费银子。图书一旦走上精装、贵族的路子，那么阅读的功能还能剩下多少呢？

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平装软皮书，低调、亲民、方便、舒适。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读的人，看来也只有买得起平装软皮书的读者了。

买得起豪华精装书的人不读书，白白让书架上的图书蒙尘。读书原本是很普通的文化生活，如今却成为一件很奢侈的事，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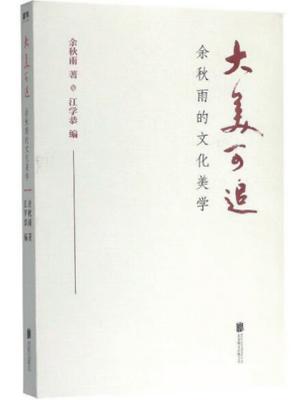
揭示中华文化的丰饶与大美

——读余秋雨《大美可追》

□ 刘昌宇

从《文化苦旅》到《中国文脉》再到《中国文化课》，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以磅礴的写作激情，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可谓硕果累累。

文以载道，历来是他的创作主旨，特别是他的新近之作《大美可追：余秋雨的文化美学》(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7月出版)，在纵论文化的同时，更是创见性地融入了系列美学思考，相得益彰中，无疑提升了文化布道的思想品位和精神价值。



在《大美可追》的序言中，余秋雨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师生缘——江学恭等三位学生多舛的人生际遇，让他体悟到了文化对个人、对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书中感慨地写道“人世间能挽救生命的，除了药，还有美。除了医学，还有美学。”在他看来，文化之美，不但能在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情操，还能以暖彻心扉的正义力量，推动社会昂然前行。

余秋雨告诉我们，文化一旦与美结缘，便会呈现出丰饶的面相。在《美：人间尊严的关键形态》一章里，他详解了文化之美的不同内涵。对个体的人来说，文化之美主要体现在生命教化的层面上，它能使人“集中了自信、教养、风度、见识，最终凝结成一种外化形态，使人举手投足便气象非凡”。而对社会而言，文化之美则更多注重的是价值引领。它将世间的真与善兼收并蓄，最终以美的思想和美的表现形式，让整个社会变得斑斓多姿。

余秋雨在解读完两种文化之美之后，急切吁求“人类的文明需要不断前进，人类在审美领域所取得的自由需要不断开拓”。他同时寄希望于“在美的领域里，应该流淌着生命的绿色、青春的气息”。这种美的彻悟，无疑强化了人们对文化的相关认识，也使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命题，变得越发重要。

《大美可追》用意高深，视域开阔。

它不但聚焦文学、书画这些高雅的文艺品类，还寄情于昆曲、茶饮这类闲适的生活现场，并勾连于灵动脱俗的山水和人生，阐明着对宏大艺术的深刻理解。在《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一章里，余秋雨就开门见山地指出，“艺术不是歌颂的手段，也不是批判的对象。”它来源于生活，又以其高蹈的思想蕴涵，各类繁复的表现形式，显现出普遍高于生活的旨趣。

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艺术的核心要义，并更好地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在书中，余秋雨给出了答案：“紧紧地贴住人生，让大家感悟人生的美好、苦涩和全部味道。”换言之，艺术只有做到以人为本，表现真实的人性、人情，展现出人们惯常的喜悦欢乐，才有可能展现出跌宕的人生，继而露出出现实生活的多彩样貌。

书中，对于艺术的创造话题，余秋雨也没有止于泛泛而谈，而是前瞻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他认为艺术的不竭动力，来源于持续不断的创新、创造。而在社会的多重创造当中，艺术创造却是最自由的。“它应该走在前面”，他把艺术创造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论证，既显示了对各类艺术的由衷喜爱，又从艺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彰显出他强烈的文化自信。

有意思的是，余秋雨还在书中别有

见地指出，“书法、昆曲、普洱茶是中国举世独有的三项文化”。它们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书法代表着国人的一种文化品格，通过它可以修炼自己的精神境界。而昆曲，则堪称东方美学格局的标本。至于普洱茶，传递的却是一种文化趋势，即从当前到未来，文化的重心正从“文本文化”转向“生态文化”。这样的论断，充分体现出他深厚的“大文化”观，并代表了他贯穿古今式的文化思考。

平心而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实远非书法、昆曲、普洱茶这三种，但独具慧眼的余秋雨，却能从它们的精神陶冶、美学格局、文化重心等不同维度，别出心裁地对中国文化的生命质地和丰赡思想予以全新的诠释，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不觉又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这样的文化求道，难道不是很美吗？

余秋雨以厚重的《大美可追》，传递着他热切的文化思索，更进一步的挖掘中华文化的内在意蕴，在传承中创新，就能让中华文明的薪火映照星空，照亮我们奋勇前行的文化坦途。



一名志愿者的“累”

□ 陈泰龙

毕红是个志愿者，微信上却常常在卖包子。这让我大跌眼镜。

志愿者是我朋友圈重要一极。别的志愿者发的微信多与志愿服务有关，讲的都是慈善公益活动情况。而毕红是个例外。

一次闲聊中，她喊累。“累，就不要卖包子。”我建议道。她说：“做公益是要钱的。”

现在，毕红资助湖南、四川等地的贫困学生11人，有了卖包子的钱，这一份公益才可持续。我感到了一种震动。

2009年，是毕红做公益慈善的拐点，她的公益行动走出了她供职的桃园小学。

汶川地震后，一个爱心团队邀请她参加震后灾区的帮扶工作。毕红在废墟旁看到了那个准备资助的女孩。当大手与小手拉在一起时，一个男孩的眼神跌进毕红的眸子里。毕红读出了那眼神里的渴望。帮，还是不帮？她摸了摸月薪只有1000元的口袋，迟疑了片刻之后，将另一只大手伸向了男孩。

多年以后，这个男孩用自己的方式说出了毕红的“累”。

男孩刚上大一的那个寒假，毕红就安排他来镇江勤工俭学。她不仅承担了男孩四川到镇江的往返路费，还承担了接送任务。男孩在镇江勤工俭学21天，男孩一天没落下，天天接送他。

返程的日子到了。毕红选择让男孩乘飞机，只为开拓男孩的眼界。男孩很激动，有点喜出望外。他在机场给毕红写信，说：“原以为你们挣钱很容易，没想到您这么辛苦。”

自从汶川一双手拉了四只小手之后，毕红感到钱的重要。她感到累。然而，当看到男孩在信的末尾说“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时，毕红感到的是欣慰。



看母亲跳舞

□ 甘武进

晚饭后，看我待在房间里实在有些无聊，母亲对我说：“陪我去跳跳舞吧。”

我还在南方打工的时候，就听儿子提起过，自从母亲住到城里后，很多事情起初不适应。但慢慢的，母亲也在寻找自己的生活节奏，在广场上，在大一点的超市边，只要有老年人集体跳舞的地方，一定会有她的身影。

“对于跳舞，奶奶适应得还是挺快的。”儿子在电话中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当时笑了，儿子可能不知道，她奶奶年轻时曾是村里样板戏中演铁梅的主角之一呢！对音乐的节奏挺有感觉。

走在小区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玩耍的小孩子。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向广场上、超市旁聚集，步伐稳健；跟在他们身边的孩子们，走路来没有个正形，他们连蹦带跳的，很直的街道被走成了“之”字形，留下吵闹声一片。

儿子在前面跑，我陪着母亲朝她常常跳舞的地方走去。路过一个小小的超市空地时，我看到已有四五十个老年人在那里跳开了。音乐劲爆，节奏感强。

那些人自觉地排成几行，在各自的位置上前后左右移动，手随着音乐的节奏上下左右摆动，动作整齐划一，让我叹服。

母亲经过时竟然没有一丝停留，只淡淡地看了几眼。我很奇怪地问：“不是这个地方吗？”母亲说：“这个地方太窄了，没多少人，播放的歌曲也不好听。”

哦，这就是我的母亲，真的令我有些刮目相看了。原来，她对跳舞还有自己独特的要求：舞场的气氛、音乐、人气等，已成她选择的标准了。

走过一个菜市场，上了一个斜坡，我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原来是到广场了。人真多，一大群老年人在广场的

冬日的黄昏瞬间就被黑夜笼罩。街灯早早地亮了起来。于是，人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毕红却当了一次逆行者。零下5度的冬夜，她选择陪一位“轮椅上”的青年在路边练舞。

志愿者的每一次选择，就意味着是一次更多地付出。2011年，毕红的志愿服务多了两个字：助残。

毕红先后帮助了两名残疾人，一名是“轮椅上”的青年，还有一个“轮椅上”的少年。轮椅，虽然便捷了这两个孩子的出行，但又限制了他们的远行，成为他们“融入社会”的一道坎。

助力残疾人融入社会，体现着一个城市文明的高度，也成了毕红志愿服务的新“使命”。

阳光明媚的周末，毕红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带着他们的轮椅去“远行”：推着轮椅，金山湖畔看荷花；推着轮椅，焦山炮台说烟烟；推着轮椅，北固山下吟宋词……

山水怡情，典故励志。“轮椅上”的他们脸上多了笑容，眼睛闪着光亮。那个青年，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和兴奋，萌生了做点事挣点钱的念头。

桃园小学是毕红志愿服务的起点。一些学生家长不能准时来接，毕红就将他们带回教室，指导他们做家庭作业。起初是自己班的，没多久，其他班的也加了进来。渐渐的，桃园小学有个不收学费的“延时班”就传开了，毕红也因此获得“爱心大使”的称号。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郑智化的《水手》于毕红而言，听下来不是那么轻松。但毕红坚持下来了。她关爱的困境儿童，有的已经上了大学，有的已经毕业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如今，毕红的朋友圈也在做大。除了自己资助贫困儿童，通过她牵线帮扶的困境儿童也达到26人。